

据说来源于顾炎武先生所著《日知录》中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以来,始终在华夏大地上回响,激励着仁人志士的豪迈,高扬着民族振兴的情怀。其实,此名句之出典和其主人,可圈可点之处颇多。

江东顾氏望族,在亭林老先生出生时,已是家道中落。这位据传相貌丑怪、性情耿介的血性男儿,不屑繁文缛节之俗,却关心现实民生,注重经世学问。“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早年即断然弃绝科举之道,发愤钻研经世之学,博览群书,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虽有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广为流传,而知晓亭林的人并不多,能登堂入室于《日知录》,皓首探究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更属稀罕。

亭林先生的思想前辈、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同样为后生们所激赏。其实,顾宪成与顾炎武是大同乡。他们的家乡,无论是无锡,抑或昆山,都系依语软言、小桥觞咏、柔韵嫩柳。但是,就是江南水乡的环境,却孕育了铁血男儿的气概和气压万里的抱负。亭林先生的激愤、忧愁、哀怨,都表现在后人所常挂在嘴边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理名言中,他那不朽的传世著述,字字诠释着“声声入耳”,句句演绎着“事事关心”。两位顾氏老先生,不仅有着姓氏上的巧合,还有着生卒年上的某种宿命。万历四十年,一代名士东林先生怀着对“天下”满目疮痍的惆怅,含恨于锡山张泾家中离世;就在第二年,公元1613年,又一位思想巨匠亭林先生带着警醒世道的使命,在昆山的千灯镇呱呱落地。两位顾氏老先生之间更有着心灵气脉上的相通、相续,演绎了一场自晚明万历至前清康熙年间中华知识精英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东林的血风腥雨尚未抹干,复社的大纛又在江南飘扬。

其实,老先生著作中的原话,并非如人们普遍传诵了如此久远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句式。《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篇中,在评判正始玄学之学风之际,亭林先生感慨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矛头直指魏晋交替之际那些政坛的齷齪事。正始年间知识精英“竹林七贤”中,唯一官运亨通的山巨源,不仅使他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书》,更激起亭林先生的痛斥:“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山涛以四时有季节之变,人更应顺应政治空气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立场为由,硬拖着本不欲与司马集团为伍的嵇康之子嵇绍为官,而嵇绍因山涛对其有抚养之恩,而极不情愿地去为有着杀父之仇的司马集团效力。一向注重气节的亭林先生对山涛的鄙弃,当在情理之中。由此,亭林先生感叹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段话语被三百年后的梁启超先生作了归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思痛》中,首先说到:“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

匹夫与天下

◆ 金易明



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由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终定型并被广泛流传。

世人在慷慨激昂地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时,往往将“天下”与朝廷相混淆,朝廷是有姓的,赵钱孙李。于是,“天下”乃为“家天下”,而“家天下”与平头百姓之关系实在并不大。亭林先生的笔下,“天下”与“朝廷”是有区别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时代,“国家”仅仅是“易姓改号”的政治集团。而“天下”则是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亭林先生之“保天下”即是保全中华文明、传承中华文化的“天下”。此“天下”的兴亡与否,关乎于民生的安宁与否,关系到民族的存亡盛衰。

所谓匹夫者,在亭林先生的笔下,系指“天下”苍生,黎民百姓。百姓作为个人,虽人微言轻,但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自会掂量“天下”的云蒸霞蔚、百业兴旺;百姓心中自有一把尺,应能丈量“天下”的寡廉鲜耻、仁义充塞。“天下”的兴亡,与百姓的民生唇齿相依,“天下”的兴亡,与百姓的民权休戚相关;而仁义的蔚然成风,诚意的随处可见、人性的普世照耀,需要芸芸众生的共业铸就。无怪乎梁启超先生于国难当头、国是唯艰之时,将亭林先生的话语,以直白的警句形式表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唤醒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共同携手创造自身及民族的美好未来。

亭林先生不仅如此说,而且更为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如是为。老先生律已极严,身处逆境而终无颓唐之想。刚正不阿,坚毅不屈是他操行气节的充分展现,致令刚入关的满清朝廷都为之敬畏不已。亭林先生的为学,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其笃实的考据探索,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清代朴学之先河,被誉为明清学问有根柢第一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特别是老先生强调为学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秉承“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认为学问功底的积累与操守气节的砥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他关心时事,提倡“利国富民”,其“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之真知灼见,令人深思。

晚年的亭林先生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世。老先生筑土室于华阴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以作自嘲。但却“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人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可见即使隐居,仍不忘其志。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即1682年,在七十一寿,于东林先生故世七十年后,在山西临汾曲沃辞世。

亭林先生留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当成为民族文化的精神瑰宝!

亭林故居



本文图片: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女德』的演变

漫谈《世说新语·贤媛》篇

◆ 邓婉莹

《世说新语》被鲁迅称作“名士底教科书”,书中专设一门“贤媛”,道德评判的意味不言而喻,大概也算得上“名媛的教科书”了。然而,较之汉代的理论专著《女诫》,以及个案丰富的《列女传》,某些标准已经转变。今人谈起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桎梏,三从四德是诛伐的重点,其实不同时代,人们对“四德”的解读也有所不同,从《贤媛》中一则小故事,便可窥出一二。

故事里许允娶了阮家的女儿,奇丑,丑到拜完堂新郎连洞房也不愿进。后有客人来劝,说阮家会嫁丑女儿给你自然有其道理。许允回去,“既见妇,即欲出”,新妇也知道这一去是谁也劝不回了,便“捉裾停之”。许允于是发难,问“妇有四德,卿有其几?”阮家女倒也诚恳,“新妇所乏唯容尔。”但随即反诘“士有百行,君有几?”趁对方自得之际,扣上一顶“好色不好德”的帽子,许允惭愧,遂相敬重。

四德一说,首见《周礼·天官·内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工。”郑玄作注曰:“德谓贞顺,言谓辞令,容谓婉婉,功谓丝枲。”班昭解释得更为具体,“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如果没有郑玄的注解和班昭的阐释,想来很多人会把妇容和美丽联系起来。婉,顺也,婉婉即柔顺,班昭将其具体到“服饰鲜洁”、“身不垢辱”,和郑注略有出入,但直言不必美丽,还是领会了精神的。大概美色容易使人沉溺,《列女传·孽嬖传》所载的妹喜、夏姬之辈,都是美于色而薄于德,祸及亡国;《辩通传》中的钟离春、宿瘤女诸人,貌丑而德盛,却“名声光荣”。

许允问其妻四德有几,自是针对她的貌丑,许妇也承认“所乏唯容”,虽然文中主题仍是儒家推崇的“贤贤易色”,这种双方的默契却可看出时人对“妇容”的理解,已经从“不必美丽”转变为美丽为上。

汉末以来战乱频仍,礼乐废弛,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对美的自然向往被唤醒,并报以更多关注。渡江以后,在江南秀山水的熏染下,人们的审美意识由自发到自觉,山水之美,人情之美,声律之美,风物之美,一时“声色大开”,伴随而来的,便是“文学的自觉”。

对容貌美的追捧与关注,还可见于《世说》其他篇章。诸如醉眠美妇之侧的阮籍,观者如堵墙的美少年卫玠,被妇人连手紫之的潘岳等等。封建礼教一直强调男女之大防,此时却不再严苛如前,其他压制人性的道德桎梏,亦出现松动。通观《世说》,不难发现四德中的另外三个标准,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郑玄注妇德为贞顺,《列女传·贞顺传》中所列十五则故事,有一半以上是彰扬女子不再嫁的。其实在汉代,社会对女子再嫁的态度尚算宽容,贵族女性再嫁者也很多。但当时的舆论导向还

是提倡女子守节,汉宣帝就曾下诏“赐赏贞妇顺女以帛”。

《假鹑》中也有女子再嫁的记载:庾氏寡,誓不再嫁,被家人使诈嫁给了江彪,久哭不从,江彪也不相逼,察言观色,假装做梦受惊来试探,庾氏呼婢唤之。江彪便道“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

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守节思想的影响,但面对继夫的小小诈术,妇人并非恪守礼节不为所动,而是表示出关心,最终改变主意。对女子的再嫁,作者没有置评,但“情义遂笃”四字,已是一种肯定。《伤逝》中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可视作补充,对儿媳的再嫁,庾亮态度是如此当然“贤女尚少,故其宜也”。当时社会风气的开化,也可见一斑。

已婚的女子可以再嫁,未婚的女子也就有权去追求自己的感情,《惑溺》中记载了贾充之女和韩寿的私情,未婚私通,本为礼法不容,但奸情败露后,贾充竟以女妻寿,促成这段姻缘。干宝《晋记总论》言当时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正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情之所钟,情之使然,所以才有了六朝乐府中那些对爱情大胆而率真的表露。

郑玄注妇言为辞令,难免模糊,班昭则给了明确的规定,不须能言善辩,只要措词得体,不道恶语。何谓得体?《列女传·辩通传》中所记,大概都可算典范。管仲妾解惑,弓工妻说公,皆引经据典、委婉设辞,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缇萦救父,寥寥数句使父亲免于肉刑,真正打动天子的,恐怕不是辩才,而是胆色和孝行。

《世说·贤媛》中也有类似的



描写:庾玉台因牵连谋逆要被杀,儿媳光着脚去向伯父桓温求情,门官不许进,便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

魏晋时代,各利益集团争斗激烈,士族往往牵连其中,无端惹来杀身乃至灭门之祸,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下,庾氏的理由其实很苍白,态度更是无礼,居然直呼公公名讳,所幸桓温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没有责备,还赦免了其夫婿一门。徒跣是为不庄,犯讳是为不敬,既无妇容,亦无妇德,却被收在《贤媛》之中,可见汉儒们加在女子身上的种种道德枷锁,到这时已宽松许多。话说回头,面对这种情况,若是再谨守四德,柔顺以对,恐怕连是其门也不得人的。

至于谢道韞那句有名的恨语“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显然也不合班昭“择词而说”,不厌于人的“妇言”之道,率性而出,却是感情的真实流露,所以编者亦不以为忤,依然归之于“贤媛”。

后世所说女工往往包括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当时却似乎特指纺绩。《礼记·内则》言女子“执麻枲,治丝茧,织红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纺绩很大程度是为了供持家用,对家境富足的上层妇女来说,其实

是用不到的。《列女传》中的女子在守节时多是纺绩度日,带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而《世说》中,几乎看不到此意象的出现,准确地说,在述及贤德女子事迹的《贤媛》中,除了那个著名的陶母剪发待宾的故事,几乎看不到其他关于妇工的描写。

《晋阳秋》说陶母“纺绩以资给侃”,但陶侃“家酷贫”,此多为生活所迫,不具典型性。干宝《晋纪总论》中的评价,倒可以代表当时大部分女子,其曰“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如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既然不用耗时于女工,这些女子便有充分的时间“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牧渔。登高临水,去境庆吊。开车褰帷,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抱朴子·外篇·疾谬》)这种热闹的聚会和出游活动,有山有水,有酒有歌,有任情尚性的佳人名士,一方面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另一方面也在魏晋风流之后,演绎出六朝旖旎。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现实又是作品滋生的土壤,通过《世说》中几则故事的解读,我们可以窥见魏晋以来礼教的衰落,女性地位的提高,审美意识的发展等,其所带来的,便是文学的自觉,乃至人自身的觉醒。而对“四德”的解读,历经六朝烟云,以至殊为开放的大唐盛世,随着儒学复兴和宋明理学的发展,再次被禁锢在汉儒的道德圈中,甚至变本加厉,与所谓“三从”一起,几乎成为封建礼教的代称。时至近代,胡适先生所云新“四德”,更多是谐谑之作,今时也有人以为女子“四德”并非全是糟粕,或可结合当代再赋新说,其中是非,恐怕要交与时间去评判了。